

王蒙 著

名一人一谈一艺

从实招来

王蒙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自己走更远
我的作品

10
W34

● 王 蒙

从实招来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能是王蒙所写的一本地一真意放但是比我自己更小的作品会比之更重的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实招来/王蒙著. -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9
(名人谈艺丛书)

ISBN 7-5013-1539-6

I . 从… II . 王… III . 文艺学 - 研究 IV .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2863 号

书名 从实招来

CONG SHI ZHAO LAI

著者 王 蒙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35(千字)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书号 ISBN 7-5013-1539-6/G·416

定价 22.00 元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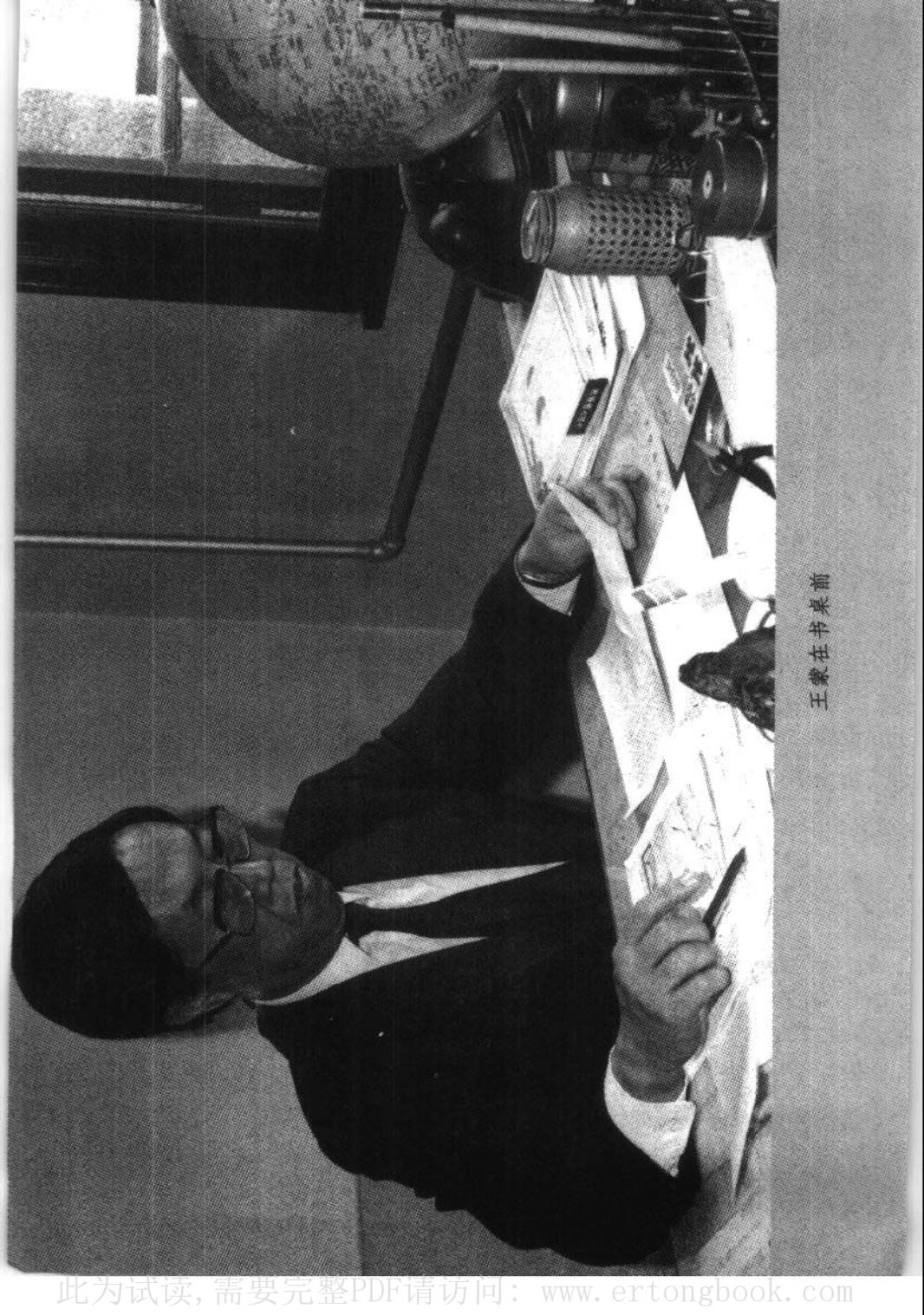
我的写作

我是王蒙

我只能写作

我的作品会比我自己更长久

我的作品会比我自己走更远的路



王康在书桌前

我的写作

从1953年深秋那个晚上我提起笔来开始写《青春万岁》初稿的最初几行字的时候算起，已经是整整四十个年头了。

我为了我们的国家、社会、生活更加美好而写作。我为什么写作？它的答案与为什么革命为什么活着是一样的。

我爱生活，我叹息一切美好的瞬间的短促。只有文学才能使美好的瞬间与永恒连接起来。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文学就是怀念，文学就是复苏，文学就是青春，文学就是人生的滋味，文学就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文学就是生命所剩余的一切。

至少我有理由指望，我的作品会比我自己更长久。我已经不在的时候，也许有一个青年会为我的某一篇散文而微笑，也许有一个少女会为我的某一篇诗歌而动容，也许有一位长者会为我的某一篇小说而煎熬。单是这样想一想已经够让人激动的了。

至少我有理由希望，我的作品会比我自己走更远的路。我的作品会走进我还没有机会走进的房子，我的作品会说我还不会说的话，我的作品会有比我自己更宽阔的胸怀和臂膀，拥抱



我们的这个星球，拥抱我们的这个世界，拥抱那个叫做人的同类。

至少我有理由希望，在写作的时候我能够比我自己还要好一点，聪明一点，丰富一点，有时候更执著一点，也有时候更豁达一点，因为我是太平凡了，我是有太多的缺点以至于缺陷。我不满意于自己，我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投胎一次，生活一次，我只能在写作里得到一些校正与补偿。

我喜欢语言，也喜欢文字，在语言和文字中间，我如鱼得水。语言和文字是我的比人民币和美金更重要的财富，我要积累它们，更要使用经营——有时候是挥霍浪费它们。

我喜欢你也喜欢他，只有在写作当中，我们才得相识，相交，成为朋友。而如果没有朋友，我们是多么孤独呀！

我喜欢写作还因为我并不是总是快乐的。谁能回避那些沉重的不愉快的甚至于可怕的事情呢？然而当这一切经验都变成文学的契机的时候，人生就比较能够忍受了。

文学使往日重新鲜活，文学使黯淡变成趣味——至少是自嘲，文学使痛苦焕发辉煌，文学使灰烬蓬勃温热。文学使有所作为者尽情发挥，文学是仁人志士的战场、十字架至少是试验场；文学又是智者弱者无所作为者孤独者清淡者自大狂自恋狂胆小者规避与逃遁者的一个“自欺欺人”的游戏——避难所。

文学是有为更是无为。文学是有为的无为，无为的有为。

文学是一种快乐。文学是一种疾病。文学是一种手段。文学是一种交际。文学是一段浪漫。文学是一种冒险。文学是一种休息。文学是上帝。文学是奴婢。文学是天使。文学是娼妓。文学是鲜艳的花朵。文学是一剂不治病的药。文学是一锅稀粥。文学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

最后，我写作，还因为我是王蒙。我只能是王蒙，我希望我是王蒙，所以我只能写作。所以我还要一页一页一篇一篇一本一本本地一再写下去。我愿意放弃这和放弃那。但是我不能放弃写作。请原谅了，再一次地请求原谅了。

阿门。

1994年

妹妹正在浇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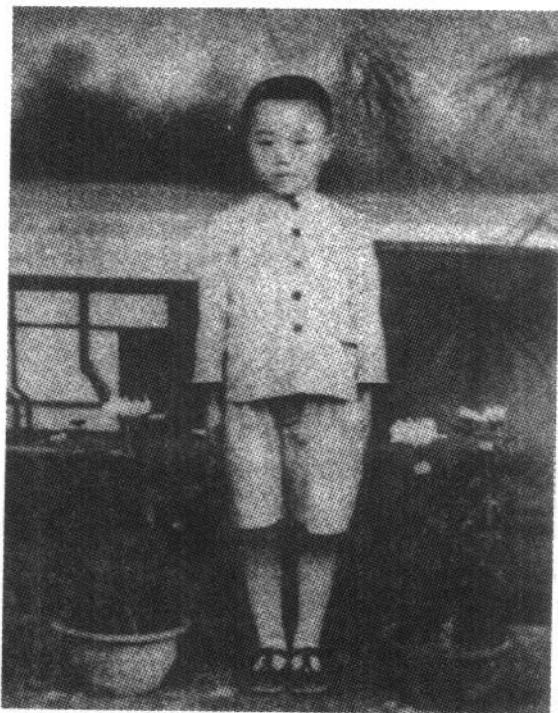
6

从实招来

王蒙

我那个时候，小学一年级是没有作文课的，只知道念课文：“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姊姊说：‘太阳升起来了。’”

二年级开始有造句课。记得第一次造句是用“因为”。不满7周岁的我不知为什么突发奇想，想造一个比较长的句



童年时代的王蒙

子。还记得我的句子是这样的：

“上学回家，看到妹妹正在浇花呢。我很高兴，因为从小她就 qín(勤)láo(劳)，她不 lǎn(懒)dùo(惰)。”

我是洋洋得意的。我的第一次造句就写上了有意义的内容，句以载道，有深度有道理，似乎也有来自生活的创造性，当然比“我肚子痛，因为多吃了冰棍”之类的句子高明，果然，我受到了级任(犹今之班主任)老师的赞赏。

“正在浇花呢”，我是这样记得的。我从小爱用语气助词，“呢、吗、呀、了、啦”，特别是“呢”。

至于第一次作文，没有印象。第一次好作文，不知道。反正上初中后，由于种种原因，作文也不敢写真实的思想情感，何好之有?那篇由于登在校刊上而留下来的《春天的心》，其实做的时候就有意识地东拉西扯玩些辞藻，回避其真情实感。

我记得第一次造句、好造句，却不记得第一次好作文。

1991年11月

王蒙

我的第一篇小说

我的第一部小说是长篇《青春万岁》。小时候，大约 10 岁左右吧，我曾在一个笔记本上练习写“小说”，我至今记得那内容是描写一个清道夫（现在没有这个名词了，现称清洁工）的一天，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个“清道夫”的自白，说他一天所得勉强“糊口而已”，不知道童年的我为什么要让一个“清道夫” 跪文。当然，那是不能算数的。

1953 年我 19 岁，我已是青年团的干部，当时还不叫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有感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的大好形势，我曾申请去考大学，我想学土木建筑。这说不定与我看了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第一个职务》有关，工地、脚手架，卷扬机与搅拌机是那样地吸引了我。

考大学的申请未获批准。眼看着我所熟悉的那批从地下时期就参加了人民革命运动的“少共布尔什维克”也都转向了和平建设时期的文化科学与各门业务的攻关学习，我预感到了一个旧的历史时期的结束与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我怀恋革命运动中的慷慨激越、神圣庄严，我欢呼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绚丽多彩、蓬勃兴旺，我注视着历史的转变当中生

活与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与大千信息，我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旧社会的土崩瓦解、解放的欢欣，解放初期的民主改革与随后的经济建设的高潮的一代少年——青年人感到无比幸福与充实，我以为这一切是不会再原封不动地重现的了，我想把这样的生活和人记录下来。为什么不写一部长篇小说呢？

这个想法本身就使我激动，使我恐惧，使我羞怯又使我做起了诱人而又折磨人的文学之梦。

我也知道应该先从短小一点的作品开始练笔。但是，带着少年人的狂妄劲儿，我希望我写的与众不同：生活气息、诗情、哲理……我企图打破那种以一个贯穿的戏剧性的故事来结构全篇的惯常的写法。我知道我的这种追求不一定成功，也不一定易于被接受。我觉得一个短篇份量太轻了，即使被否定了，是否能证明自己的追求是不对的呢？难说，只有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感受通通倒出来，写到一部长篇里去，文学界的师长们才好判断我写的东西是否有一点价值。

这样我就给自己提供了一个艰难的、难以胜任的任务。最大的苦恼在于结构，而相反，种种情节片断、生活细节、情绪抒发、人物性格、生活场景，写起来似乎倒还自然而且丰富。可是怎么把这些片片断断的东西连结在一起呢？仅仅在纸上画结构表就画了不知多少次，越画越觉得千头万绪，头昏脑胀，脑袋简直要爆炸。

能不能集中写一个故事呢？太抱歉了，我要写的是不是一个大故事而是生活，是生活中的许多小故事。我所要反映的这一角生活本来就不是什么特殊事件，我如果硬要集中写一个故事，就只能挂一漏万，并人为地为某一个事件添油加醋、催肥拉长，从而影响作品的真实性、生活感，并无法不暴露出编造乃



至某种套子的马脚。这样的事，我不想干。

这就苦了我，东写点，西写点，斑斑点点，几乎乱成了一团，我真想把自己打一顿，哭一场，为什么这样无能？

从开始写第一稿起，我对文学的热劲一下子就猛增了。解放初期，我忙于工作，立志要做的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并没有用多大力量去学文学。1953年以来，我狂热地读起古今中外的大量名著来了，越读越入迷，越读越脑子发热，越读越觉得自己写得不行，又越读越觉得自己写得有希望。

“我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我会不会失败而白白地浪费时间精力、遭人耻笑？”开始写第一篇作品的时候也许会出现这样的念头。我的切身体会是，这种夹杂着个人得失的念头就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你，引诱着你，只能扰乱你的写作，扰乱你对于文学创作的纯洁的与刻苦的追求，甚至会影响你的本职工作，影响你与周围的同志的关系，乃至影响你的饮食、起居、神经的健康。过分的“文学狂”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它使你像发疟子一样，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得意洋洋，一会儿垂头丧气。文学事业有文学事业的守恒法则和平衡定律，头脑过热、孜孜以求，越是这样越写不成，写不好。所以，从切身的经验出发，我主张给过于热狂的文学青年适当泼一点冷水，而真正的关怀和支持，特别是对那些确有才华又确无经验的青年作者，这种关怀和支持应该藏在心里，应该化为切实有效的具体帮助，千万别随便说那些火上浇油的捧场话。

对于初学写作者来说，善于等待也是非常重要的。1954年冬，我把我的第一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初稿拿给了文学讲习所的潘之汀老师。不久，潘老师来信夸奖了我，并把此稿转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过程——我以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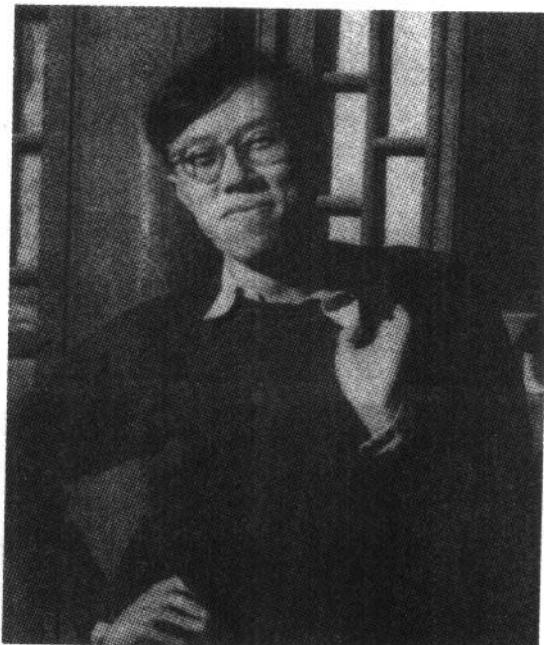


漫长的，其实这个出版社对来稿还是抓得紧、看得快的。我曾经几度骑着自行车走过北京十二条老君堂，走过这家出版社的大门，以敬畏的心情看着在门口出出进进的戴眼镜的与虽不戴眼镜但显然是极有学问的编辑老师们，他们对我的稿子会说些什么呢？我极力揣测，也揣摩不透。

差不多一年之后，1955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负责人吴小武（萧也牧）同志约我与他同到萧殷老师家去。萧老（当时他年岁其实还没有我现在大呢）热情地肯定了作品的基础，并指出了关键问题在于全书缺乏一条主线，一条贯穿线索，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和宝贵的意见。萧也牧老师说话不多，但也给了我许多恳切深沉的忠告。

1956年初，经萧殷老师帮助，由中国作家协会帮助给我联系了半年创作假，1956年9月，小说完稿。

后来，小说正式出版则是1979年秋，23年以后的事了。不知道在解放以后的出书周期方面，在每位同行



1957年11月，王蒙摄于北京小绒线胡同家中，时为受到批判后二日。

的“我的第一篇小说”的出版周期方面，是否创了点什么记录。当然，在等待的耐心上，也算是个记录了。因为我已经耐心到根本不予等待的程度了。

有些事在别的场合、别的文章中提到过，就不再絮叨了。
一首打油，就此收住：

激情如瀑思如泉，
弱笔何能驭纸船？
好梦如花苦技短，
良师作雨润心田。
文海滔滔风浪恶，
晴空丽丽路途宽，
拙痴往事成一笑，
毋馁毋骄山复山。

1984年3月





林震及其他

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林震这一人物的处理带给我不少的困难。

我无意把他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像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知识青年能够像娜斯嘉那样，似乎太理想化了。如果生活里一边是娜斯嘉、正确的同时坚信自己的正确的娜斯嘉，一边是阿尔卡琪、显然可鄙的阿尔卡琪，新与旧的斗争就会简单和顺利的多。不遂人愿的是，往往一些热情学习娜斯嘉的人竟全然不像娜斯嘉那样无可指摘，因而他不可能像娜斯嘉那样坚定、正确；他们正在成长，正在战胜周围的落后势力的斗争中战胜自身的缺陷。遵照生活的提示，我试写了林震。

林震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新人，对于他来说，除了遵照党章、党课和他心爱的小说、书籍来生活就没有别的道路。除了作好工作，使自己度过的每一个日子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以外就没有别的愿望，爱生活，爱党，爱同志，爱“美”，并为了他所爱的而斗争，是自然地融合于他的血肉；而带有他自己的年轻人的特质。

但是，林震所奉为神圣的那些新的工作和道德原则，还没

有经过生活实践的锻炼和丰富，林震本人，也没他的追求、斗争，便显得空洞浮泛，不切实际，他往往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惶惑起来。他的对于一切失误的追根究底——像他说的，“……不容许党的机关有缺点……”，虽然表现了可贵的政治责任感，却也是过分天真的幻想，生活的激流本来不是消过毒的蒸馏水。因此，他也就无力提出改正工作的有效建议，除了在区委常委会上喊几个口号以外。很明白，如果林震不好好锻炼自己使自己变得成熟，他虽然不乏某些可爱的“精神”，却也终无大用。

不论在生活里和作品里，支持娜斯嘉是较少危险的，（最近的讨论中也有祸延娜斯嘉的苗头），林震却相当使人伤脑筋，这不仅因为林震不是那么有力，也因为林震不是那么正确。何况，林震的某些言语所引起的同情的回声，又往往是与林震本人的探索语调有所不同的偏激喊叫。

我想起一个笑话，据说一位名人曾指着一个“已经证实”为新生力量的青年说：“我是一贯支持新生力量的，譬如他吧，我就支持。”但是，等到“未经证实”的新生力量找到他的时候，他却摆起十足的架子，同样，当娜斯嘉与阿尔卡琪一同走进我们的办公室，又有尼古拉耶娃同志，引见他们，那么大多数人是会支持娜斯嘉的。当林震敲响了我们的门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不掩饰在“这一个”麻袋厂事件中，我基本上站在林震方面，特别是当不仅刘世吾与韩常新嘲笑林震，并且许多可敬的同志把林震从无产阶级阵营当中开除出去的时候。林震不参加韩常新的婚礼，把烂荸荠扔在地上，（自是有碍卫生喽）究竟是上帝允许犯的“错误”，林震常常怀疑自己，一方面是软弱